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王先福.考古学视域下周代邓国“南土”政治地位变化考察[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6):37-43.

考古学视域下周代邓国“南土”政治地位变化考察

王先福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西周初年,周王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包括邓国在内的多个诸侯先后被封于“南土”。邓国自武王克商后始封,至公元前678年为楚国所灭,历300余年。其政治地位在西周早期得以确立,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前段较为稳固,西周晚期后段至春秋早期前段受到楚国的威胁虽有所削弱,但地位依然较高,春秋早期后段随着楚国北上争霸的强势崛起,邓国地位迅速衰落并最终亡于楚。传世及出土铭文青铜器和发现的邓国考古学文化遗存见证了这一变化过程。

关键词:邓国政治地位;变化;南土

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2)06-0037-07

“南土”又称“南国、南邦”,在政治上是王朝在南方的行政统治区,《诗经·大雅·崧高》有“我图尔居,莫如南土”^{[1](P1213)}之句。中原王朝对南方的控制和经营实际从夏代就已开始,江汉地区发现了众多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如襄阳王树岗遗址曾清理了2座典型二里头文化灰坑,黄陂盘龙城城址为商王朝在南方的统治中心等。甲骨文中还有“南土”“南邦”的卜辞文字。西周王朝建立后也把“南土”纳入了控制和经营范围,《礼记·乐记》载:“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2](P1132)}并在“南土”分封了多个诸侯国。《诗经·国风·汉广》载,“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1](P52)}大致反映了周王朝“南土”的地理范围。太保玉戈铭文“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明确提到了召公巡视南国时循汉水而行。^[3]学者对其地理范围的考证基本一致,“南土”约在今丹水以东、汉水中游以北、淮河中游以西地区,即成周之南。而新出曾公求编钟铭文记:“皇且(祖)建于南土,蔽(蔽)蔡南门,质(誓)应京社,适于汉东。【南】方无

疆。”^[4]说明西周早期南土还在应、蔡二国以南。

自西周早期始,邓国位于汉水中游地区,扼南阳盆地南向江汉平原、东向随枣走廊的咽喉,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与相邻诸国一道成为西周王朝南方的重要屏障。而随着西周末期周王朝统治力下降和诸侯争霸政治形势的变化,邓国的地位也逐步下降,并最终为楚国所灭。

一、邓国“南土”政治地位的确立

《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5](P1320)}明确了西周初年周王朝“四土”所至,“南土”即邓、巴、濮、楚。《尚书·牧誓》中“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南土八国”^{[6](P26-33)}誓师参与武王伐纣则表明,除濮在周初前存在外,其余三国均为周初分封。这也是周代邓国之始。

同为周王朝南土,四国位置应相邻。学者多认

收稿日期:2022-08-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15ZDB03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周代邓国考古学文化研究”(18BKG019)

作者简介:王先福(1968—),男,湖北云梦人,研究员,主要从事楚文化考古研究。

为濮并非诸侯国,而应为南方部族,位于江汉流域。何光岳考证西周初年的濮地位于今丹水流域的陕东南、鄂西北、豫西南一带。^[7] 石泉考证濮地在随枣走廊西段今枣阳境内桐柏、大洪两山脉间的山区丘陵地带。^[8]

关于巴,商代甲骨文有武丁南征“巴方”的记载^[9],西周早期巴国的中心一般被认为在汉水上中游一带。如童书业认为在汉水上游的川陕之间。^[10] 石泉认为先秦巴国在汉水上游的陕东南安康地区,战国晚期受到秦、楚特别是秦的压力南迁进入川东、鄂西地区。^[11] 何光岳认为周初的巴迁到了汉水中游一带。^[12] 徐良高认为:“早期巴国北隔秦岭而毗邻周之京畿,东与庸、楚毗邻而居。”后来受到楚、庸、蜀的挤压而南迁。^[13] 赵炳清认为巴文化的源头是宝山文化,巴人故地应在汉中城固一带。^[14]

至于楚,特别是早期楚国的中心一直是历代学者致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史记·楚世家》记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15](P1691~1692)} 而关于早期楚都丹阳地望,先后形成了当涂说、秭归说、淅川说、枝江说四种观点,后二说渐成主流,但均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16](P1~56)} 近年来,随着清华简《楚居》的发现,淅川说似乎更胜一筹。虽然《楚居》通篇未提“丹阳”,但有众多与楚君相关的地名,和熊绎被封有关,如“至熊绎与屈紃,思都嗑卜徙于夷屯,为榭室,室既成,无以內之,乃窃都人之榭(榭)以祭”^{[17](P117~124,180~194)},可证熊绎之都在夷屯,该地与都相邻。学者们研究都的地望有上都、下都之分,并分别定位于今湖北宜城、陕西古商密(也有相反者),下都约当春秋中期以前被楚灭。徐少华在分析都国青铜器和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考证出春秋以前的上、下都均在丹水流域。^[18] 陈昌远、黄锦前等均认为下都在今古商密、淅川附近。^[19,20] 刘彬徽和《楚居》整理者也认为都国在此。^[21] 据此判断,与都国邻近的楚国当在汉水上游。

作为周王朝的“南土”,巴、濮、楚均位于汉水上中游一带,邓当不会例外。

“安州六器”和静方鼎是了解西周早期“南土”形势的重要青铜器。中甗载:“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孰应在曾。……中省自方、邓、洧(汎)、鄆邦,在鄂师(次)。白买父乃用厥人戍汉中州,曰段、曰旒。”^{[22](P595)} 铭文记述中先在曾驻扎,后接到周王命令巡视南国,自北向南经过方、邓、洧(汎)、鄆,最终达到鄂。

关于“安州六器”的时代,尽管有成王^[23,24] 康王^[25]、昭王^{[26](P291)}等多说,但均认可为西周早期。铭文涉及到当时几个重要地点或诸侯国,学者一般认为方即方城,以唐兰为代表^{[26](P287)},位于桐柏山西北端与伏牛山东端之间的隘口,在今河南方城县附近。而根据新出西周早期鄂国青铜器铭文考证,鄂当位于今随枣走廊的随州羊子山附近。按照中“省南国”的顺序看,邓当在方、鄂间,但无法明确其与曾的位置关系。曾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地点或诸侯国。

静方鼎铭文主要提到了曾、鄂:“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卑(俾)女(汝)□嗣(司)在曾、鄂师。’”^[27]可见曾、鄂地位十分突出。

曾国不见于传世文献,但近年来诸多曾国考古新发现,如随州叶家山墓地、枣阳郭家庙墓地、随州文峰塔墓地、京山苏家垄墓地、随州汉东东路墓地、随州枣树林墓地等厘清了其历史和地望,特别是叶家山 M111、曾侯與编钟、随仲嬭加编钟、曾公求编钟的发现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由此建构起了曾国始封、汉东大国、曾随一体、“左右楚王”和多次迁都的历史进程。曾国始封者为“南公”,即南宫括;特别是曾侯與钟、嬭加钟、曾公求钟提到了周王朝分封曾国的地位和作用,西周早期,南宫括作为“稷之玄孙”因“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而“受大命”“出邦于曾”,很可能与齐、鲁封国一样,南宫括本人在王室辅佐周王,其子就封。其政治中心就在今随州东北部的叶家山墓地附近,其重要任务是“君此淮夷,临有江夏”,“涉政(征)淮夷,至于繁湯(陽)”,即负有监视、征伐、管理淮夷和江夏地区的责任。另据传世和苏家垄墓地出土的曾伯黍簠“金道锡行”铭文知,曾国还肩负贯通周王朝铜、锡战略资源的责任。作为周的同姓国,曾国在“南土”的地位无疑是最高。前述枣树林墓地新出曾公求编钟铭文可大致勾画出曾国的辖域范围在汉东,蔡、应国以南,其南部无边界。

同时,商末周初见诸文献或青铜器铭文的其他“南土”诸侯国还有庸、卢、厉、唐、谢、都等。庸、卢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厉还出现在清华简《楚居》中,“穴熊”妻“妣疒(厉)”,即厉国女子;唐国除文献多有记载外,也见于青铜器铭文中;谢国文献记载仅一条,也偶见于青铜器铭文中;都青铜器铭文多见,延续时间较长,前引《楚居》中还有熊绎起榭室劫都人之榭祭祀的记录。

一般认为,庸国在今汉水上游的竹山县^[28]。卢即卢戎国,汉中卢(庐)县,大致在今汉水以南的南漳

县北、襄阳县西区域^[29]。

厉国,或为赖国,太保玉戈有铭文“令𠄎侯辟,用𠄎走百人”。“𠄎”一般释为“厉”,在湖北随州北境。^[30,31]还有“安州六器”之中解铭文“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赐中𠄎(厉)侯”^{[32](P353)}。“𠄎”,李学勤释为“厉”,地在随州北境。^[33]徐少华考证厉在随枣走廊的随州东北殷店一带,也有认为其在随州厉山附近者^[34]。尽管该厉的位置有所不同,但都在随枣走廊中部附近。

前述中解之“庚”,李学勤释为“唐”,认为其地在随州西北境。^[33]《读史方輿纪要》卷77德安府随州唐城和《大清一统志》卷267德安府古迹古唐城条目下,也定其在随州西北的唐县镇一带。徐少华考证其国姓为姬姓,即周同姓国,为“汉阳诸姬”之一,在今河南唐河县一带。其位置大体均在随枣走廊西部范围内。

与中甗同出之中方鼎记:“隹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執王位在𠄎。”《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隶定“𠄎”为“𠄎”。^{[35](P341)}徐少华梳理古今著作对该字的隶定后,进一步考订该字应为“射”,通“谢”,即西周晚期周宣王迁申之“谢”邑(国)。谢国在文献中仅见于《诗经·大雅·崧高》:“𠄎𠄎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1](P1210)}即申国位于谢国故地,申则在今河南南阳市区(详见后考)。

郟国据《世本·氏姓篇》:“郟,允姓国,昌意降居为侯。”^{[36](P242)}可见其为古老之国。《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晋伐郟。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杜预注:郟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郟县。^{[5](P356~357)}前已考上、下都均在古商密、今河南西峡以西的区域。

不难看出,西周早期周王朝在“南土”有众多诸侯国,其中曾国地位最高,是周王朝在南方的代言人。其他包括鄂、巴、庸、楚、邓、厉、唐、卢、谢、都在内的诸侯国和濮(国或族)则作为周王朝的南部屏障纳入其统治体系,巴、庸、楚位于汉水上游,卢在汉水中游南岸,鄂、曾、厉、唐在汉水中游以东的随枣走廊,濮可能散居于汉水上中游的山地中,而汉水中游北岸的南阳盆地则应是谢、邓的地域。其中曾、唐国为周的同姓国,其余均为异姓诸侯。周王朝在分封的同时,也要随时安抚他们,因此经常安排重臣“省

南国”。周人分封建国的目的主要是“以藩屏周”,某种程度上也是防范夏商后裔和蛮、戎、夷、狄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方城以南、扼守中原、向南过汉水直通江汉腹地和向东经随枣走廊达鄂东南要地的邓国政治地位应该不低。

传世和出土青铜器确认最早的邓国也为西周早期,该时期的青铜器包括1件邓公盃、2件邓小仲方鼎、2件邓仲牺尊,前者的时代原认定为商代晚期,经考证应在西周早期的成康时期,其时邓国国君爵称“公”,即诸侯五等爵秩的最高等级,其出土于山东,可能为邓国交流之器;后4件的时代为康昭时期,其中“邓仲牺尊”出土于较本器时代稍晚、可能为周王室重要贵族井叔(M157)夫人之墓(M163)中^[37],表明与井叔家族有联系之邓国的地位在周王朝应较高。

更早的西周初年,传世孟爵铭文亦可寻邓国之踪,铭文记:“隹王初赉于成周,王令孟宁邓伯。”^{[38](P305)}时王为成王,邓国国君爵称“伯”,也证其地位较高;而从成王“令孟宁邓伯”看,当时邓国的实力还较强。

昭王时,周“南土”发生的重大事件是昭王两次南征。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噎,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又云:“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薇,其年,王南巡不返。”^{[39](P46)}《史记·周本纪》也有“昭王南巡不返,卒于江上”^{[15](P134)}的记载。青铜器铭文也多有记录,在此不赘述。其时昭王征伐的对象是楚还是楚蛮也有不同看法^{[40](P175~184)},但不影响邓国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如果说前述曾侯與、曾公求钟铭提到曾国防范的目标主要是淮夷的话,那么对楚或楚蛮防范的重任或许就落到更靠近他们的邓国了。

可以说,西周早期是邓国在“南土”政治地位的确立时期,它作为周王朝的封国,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强的国力。

二、邓国“南土”政治地位的稳固

西周中期的穆王至夷王间,传世文献关于邓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南土”诸侯国如曾、鄂、楚、庸、巴、厉等或基本失载,或记述简略。即使是楚国,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清华简《楚居》也只是一笔带过。倒是在东土,发生了周王朝与淮夷的多次征战,或许周王朝的主要力量在对付淮夷上,南土则相对平静。

而邓国在传世文献中根本没有涉及,所发现的邓国青铜器也很少。西周中期前段邓国青铜器仅见1件邓公鼎,器型不大,它作为祭器昭示着邓国公族

的存续,其爵秩仍为“公”。西周中期后段,相同的4件簋均出土于平顶山应国墓地,铭文相同:“登(邓)公作应媯媯簋,其永宝用。”^[41~43]内容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一是作器者为邓国国君“邓公”;二是标明了器物的性质为媯器;三是确认了邓国的国姓为“媯”;四是邓公嫁女的姻亲国为应国。《国语·郑语》载史伯语:“武王之子,应、韩不在,其在晋乎?”^{[44](P523)}即应国为武王之后,分封于西周早期,为周王朝同姓国。邓、应两国的联姻自然有着特别的意义,也进一步说明了当时邓国的重要地位。

西周中期后段的夷王时期,周王朝南土政治势力变得紧张而复杂起来,东南有鄂国反叛,南有楚熊渠扩张。

依前考,鄂国位于随枣走廊的随州安居羊子山附近。大约在孝夷时期,鄂国与周王朝还保持密切关系,据鄂侯驭方鼎铭文,周王南征返程驻扎“坯”时,鄂侯驭方献礼,周王与之宴射并赏赐了驭方。^{[45](P376)}但在禹鼎铭文中,“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寒。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裂伐鄂侯驭方,无遗寿幼。’……禹以武公徒御至于鄂,敦伐鄂,休获厥君驭方。”^{[35](P403~404)}即鄂侯驭方反叛被灭国,“无遗寿幼”。不过,从2012年今河南南阳北部不远夏饷铺墓地发现多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鄂侯、鄂侯夫人墓的情况分析,鄂公族很可能并未被灭,而是北迁到了夏饷铺附近。夏饷铺西北不远就是西鄂故城遗址,可能是鄂国公族北迁后的居址。鄂国北迁后,其原统治区空虚。

而差不多同时,南边的楚君熊渠开始了第一次对外扩张,“不与中国之号谥”,并立三子为王。^{[15](P1692)}尽管该行动或有“试探”性质,但也表明了楚国寻求发展的决心,也是周王室衰微的反映。正如《国语·郑语》所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44](P507~510)}鉴于楚国强势崛起,周王朝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关于西周晚期的楚国地望,仍有多种观点。从清华简《楚居》看:熊渠之“都”与熊绎名称相同,亦为“夷屯”,但是否在同一位置尚难确定。后几经迁徙,至西周末年若敖“徙居都”,该都有可能仍为下都。但从大多数学者考证昭王南征“楚”到达汉水的情况看,其时汉水以南应已成为楚国的重要区域。即楚国在西周晚期仍然占据着汉水上游地区,并扩展到了汉水以南。为此,周宣王将王舅申伯及吕国迁到了南阳盆地北部。如前引《诗经·大雅·崧高》之文可知,申、甫(即吕)

的责任在“维周之翰”。当然,从前述鄂国被灭北迁夏饷铺附近的情况分析,申、吕的南迁一方面或是为了监视鄂国公族,另一方面或是周王朝对楚国设置的屏障。申、吕作为周宣王南迁的诸侯国,当时两国均具有一定实力,所以,他们才成为周王朝抵御楚国的重要诸侯国。申国所封在原谢地,徐少华考证申、吕的都城分别位于今南阳市区古宛城、南阳市区西三十里的董吕村附近。

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前段的曾(随)国不见于传世文献,也未发现该时期的曾国铭文青铜器,本有着“君此淮夷”任务且位于鄂国东北、距淮夷更近的曾国,此时的情况则未见记载。不过,从考古资料看,西周晚期后段的曾国中心西迁到了枣阳周台遗址,该遗址面积大,且发现了大型建筑。特别是遗址西侧的郭家庙墓地先后发掘了200余座墓葬,包括4座带墓道的大墓,大部分铭文青铜器为“曾”器,并有曾伯陟钺、曾侯絳白戈、曾侯作季汤半鼎等重器,表明这里为西周晚期后段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公墓地。曾国中心西迁的目的除了填补鄂国北迁后留下的空白外,应该还有向西牵制楚国的作用。

如前述,应国因武王之子而封于成王时。考古发现包括多座应侯墓在内的应国公墓地位于今河南平顶山滎阳镇;而陈、蔡二国地望,学者意见基本一致,分别位于淮河上游、桐柏山以北的今河南淮阳、上蔡一带;唐国地望与西周早期比,应该没有变化。同时,根据熊渠所攻伐的对象看,庸国依然存在,其位置应不会有大的变化。

从西周晚期“南土”的形势分析,以今汉水中游北岸为中心,偏北方位即今南阳以北有申、吕、应、陈、蔡,汉水中游以东的随枣走廊中东部有曾(随)、唐,汉水上游有庸、楚,汉水以南为楚国。若此,邓就处在汉水中游以北的中部位置,大约在南阳盆地的中南部地域。这一中心位置为邓所占据,依然彰显着邓国的重要地位,或许是作为申、吕前沿屏障,担负着抵御楚国的重任。蔡坡土岗附近出土西周晚期前段的2件“邓公牧”铜簋,邓国国君爵称仍为“公”,地位没有下降。而同墓地出土同时段的2件“侯氏簋”很可能为应侯嫁女到邓国的媯器。“侯氏簋”铭文无国属,其格式与河南平顶山M95所出4件“侯氏鬲”完全相同(因简报未发表“侯氏鬲”铭文拓片,暂无法比较二者字体结构),发掘者王龙正认为该“侯氏鬲”之侯氏当为应侯,其与此“侯氏簋”之侯氏为同一人,是应侯为女儿孟姬嫁到邓国所作的媯器。^[46]陈昭容从此说。^[47]应国作为“南土”周王朝的

同姓诸侯国,与邓联姻,应有联合邓国之意。这4件邓国重器的出土将西周晚期邓国公墓地的位置定在了附近,而结合周边同时期多处不同类型遗址来分析,不晚于该时期的邓国都城当位于其蔡坡土岗以南的邓城城址附近,或即邓城城址东南侧的周家岗遗址,这也第一次从考古学文化遗存方面印证了其时邓国中心的位置在南阳盆地南部。

除“侯氏簋”外,这一时期还有多件青铜器铭文可反映邓国与其他诸侯国的联姻关系。西周晚期前段的“邓伯氏鼎”铭文仅20字,信息量也较大。一是作器者为邓国宗族伯氏与其妻姒氏,“姒”为古老的姓氏,为夏后,这是夏后国的女子与邓联姻;二是受器者为“媯昊”,是伯氏、姒氏的女儿,结合该器于光绪出土于陕西武功的情况看,“媯昊”嫁给了宗周附近某诸侯国或周王室的贵族;三是表明其时邓国的历法已开始使用,应是邓拟强化自身政体的反映。

西周晚期后段的“邓孟方壶盖”铭文不长,但反映了邓国嫁女到监国的情况,即为邓、监联姻的证明。徐少华根据传世“叔硕父鼎”等铭文考证,监国姬姓,为周王族。^[48]

可见,当时的邓国与多个诸侯国甚至周王室保持着姻亲关系,姻亲国多为周同姓诸侯国或王室贵族,或许正是由于此种关系,邓国成为周王朝拉拢的对象。上述邓国历法的使用表明邓国有独立发展的愿望,同时,所发现的邓文化遗存出土的陶器以周文化为主,并兼有地域和自身文化因素。但居于主导地位的所有邓国青铜器几乎均为典型周文化风格,又显示出周王朝控制的严格性。这一双重特性使得邓国在周王朝“南土”的政治地位趋于稳固。同时,传世和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邓国青铜器铭文材料较多,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邓国的繁荣景象。

进入春秋早期,随着周平王东迁洛邑,“南土”的地位更为重要,但此时周王朝也进入了王室衰微、政自诸侯出的政治环境中。《史记·周本纪》:“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15](P149)}齐、楚、秦、晋四国正好对应当时周的东、南、西、北“四土”,楚国在“南土”开始坐大。在春秋早期前段的若敖、宵敖、蚘冒时期,楚国的主要精力放在内部建设和发展上,《左传·宣公十二年》:“训之以若敖、蚘冒筮路蓝缕以启山林。”^{[5](P586)}《国语·郑语》载:“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楚蚘冒于是乎始启濮。”^{[44](P524)}其他关于楚国的记载不多,“南土”的政治形势也相对稳定,诸侯国的格局基本延续自西周晚期,没有大的变化,邓国也维持着原

有的政治地位。

此时的邓国以今襄阳邓城附近为中心继续发展,而青铜器铭文也能反映部分信息。其中“不故中夫人簋盖”的信息较为重要,一是提供了邓国与“不故”联姻的信息,“不故”据考证应为山东一带的诸侯国“薄姑”^[48];二是有明确的邓国历法纪年,邓历继续使用;三是邓国国君的爵称仍为“公”。邓初生匜铭文也称“邓公”。

应该说,从西周中期到春秋早期前段,邓国在“南土”的政治地位是稳固的,国力还是比较强的,也因此受到周王室的重视。

三、邓国“南土”政治地位的衰落

“邓子孙白”夫妇墓在汉水西岸谷城擂鼓台的发现^[49,50]很可能说明了春秋早期前后段之际以邓城城址周边为中心的邓国领土的西进。但好景不长,楚武王在稳定内部后,寻求扩张,逐步灭亡周边诸侯国,并自立为王,宣告了楚国“南土”霸权的正式确立。在此过程中,“南土”平衡的政治格局被打破,邓国在“南土”的政治地位受到冲击开始衰落,并最终走向灭亡。

清华简《楚居》记,楚武王徙都免,因人口增加,“渭(溃)疆涅之波(陂)而宇人焉”^{[17](P120,181)},扩大了都城的规模,始称“郢”。他着手巩固后方,开始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形成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左传·桓公二年》(楚武王三十一年),“南土”北部的“蔡侯、郑伯会于邓(该“邓”并非当时邓国的都城,杜预注为颍川召陵县),始惧楚也”^{[5](P68,73)}。

其时,在汉水以南楚国核心区域周边,除了前述庸、卢、巴、邓国和濮族外,汉水上游还有绞、麇国,汉水中游南岸有谷、罗国,汉水以东的随枣走廊有随、唐、贰、轸、郢国等,周王朝的“南土”形势更为复杂。因此,楚国要想强大,首先需要清除周边的阻力。楚武王中后期,楚国的征伐战争更为频繁,其先后攻伐汉东大国随国,并“自立为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15](P1695)}。特别是趁巴、邓因邓南鄙鄢人杀巴使者挑起战争的情况下,大败邓师。^{[5](P99~100)}从而说明,其时邓国应仍有一定实力,文化较为发达,故巴国请求与邓国有姻亲关系的楚国介绍与其修好,楚国安排官员引荐过程中,遭到了邓南鄙鄢人的攻击,导致了楚、巴联军败邓。此战后,邓国实力可能大大削弱了。随后,楚武王更是与汉水流域的郢、绞、州、蓼、罗、卢戎、随等国发生战争,而在伐罗和最后一次伐随且身死的过程中,楚武王还得到了其夫人邓媯

的提醒和警示,邓曼的政治判断力也间接证明了邓国依然具有较强的实力。这一时期,楚武王攻伐的重点在汉水上中游南岸和汉水东岸,其巩固后方的举措为楚文王及其后北上争霸奠定了基础。

加上楚武王军事征伐的压力,邓国南土的地位开始动摇。邓国在与楚联姻的同时,也与郑国联姻。《史记·郑世家》:“(庄)公使娶邓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为昭公。”^{[15](P1761)}同时,邓国还寻求与邻近的谷国建立政治联盟,并联合朝鲁。邓国的这一系列对策都是为了继续维持自身在“南土”的政治地位,至少要保持原有的平衡。遗憾的是,邓国的措施并没有阻止楚国北扩的步伐。正是从楚武王、邓曼之子楚文王开始,楚国拉开了大规模北进的序幕。《左传·庄公六年》(楚文王二年):“楚文王伐申,过邓,……。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5](P139-140)}邓国尽管为楚的舅国,但仍逃脱不了为楚所灭的命运。就在这期间,楚国频繁出入方城之外,楚文王六年(前684年),“敝蔡师于莘,虜蔡侯献舞归”^{[5](P149)},“(楚文王)六年,伐蔡。……。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15](P1696)}。楚文王十年(前680年),楚灭息。^{[14](P163)}楚文王十二年(前678年),“秋,楚伐郑”^{[5](P166)}。也正是这一年,楚灭邓。至此,南阳盆地完全纳入了楚国版图,成为楚国北上争霸、问鼎中原的跳板和前沿基地。从春秋早期后段的邓国青铜器铭文看,邓国爵称仍为“公”,有传世“邓公午”簋^{[51](P781)}为证,该“午”很可能就是文献中的邓侯“吾离”。而文献称“侯”,整体来说,其爵位还是处于最高的两个等级。“邓公孙无忌”鼎铭文显示,邓国仍在使用自己的历法。但从春秋早中期之际、等级较高的王坡M55和前述时代稍早的谷城擂鼓台M1出土青铜容器来看,其铸造明显粗陋,工艺简单,应该是国力下降的表现,这与邓国地位的下降也是一致的。而作为具有典型特征的邓国陶器作坊遗址的王家巷遗址同时期陶器已基本为楚式风格了。

周代邓国自西周初年被封立国,到公元前678年被楚国所灭,历300余年,作为周王朝南土的重要诸侯国,经历了由弱到强再转衰直至灭亡的过程,沦为楚国北上争霸的牺牲品,与周代多个诸侯国的命运相似。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标点本)之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2]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标点本)之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3]庞怀靖.跋太保玉戈——兼论召公奭的有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1986(1).
- [4]郭长江,凡国栋,陈虎,等.曾公求编钟铭文初步释读[J].江汉考古,2020(1).
- [5]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6]顾颉刚.牧誓八国[A].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3.
- [7]何光岳.濮族的来源和迁徙——兼论楚并濮地[J].贵州社会科学,1984(3).
- [8]石泉.春秋“百濮”地望新探[A].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 [9]夏含夷,张德劭.商王武丁的末期:中国上古年代学的重构实验[J].中国文字研究,2003(00).
- [10]童书业.古巴国辨[J].文史杂志,1943(2).
- [11]石泉.古巫、巴、黔中郡故址新探[A].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 [12]何光岳.巴人的来源和迁徙[A].何浩.楚灭国考[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13]徐良高.周之南土:巴国与巴文化刍议[J].四川文物,2018(4).
- [14]赵炳清.先秦时期巴文化的形成与演变研究[J].长江文明,2017(2).
- [1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6]徐少华,尹弘兵.楚都丹阳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 [17]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战国竹书(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0.
- [18]徐少华.郢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研究[J].江汉考古,1987(3).
- [19]陈昌远.《上都府簋》与郢国地望考——河南古国史研究之二[J].中原文物,1991(4).
- [20]黄锦前.从近刊郢都器申论郢国地望及楚灭郢的年代[J].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2017(3).
- [21]刘彬德.上都府簋及楚灭郢问题简论[J].中原文物,1988(3).
-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一卷)[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 [23]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J].考古学报,1956(1).
- [24]刘启益.西周纪年[M].广州:广州教育出版社,2002.
- [25]沈长云.谈曾侯铜器铭文中的“南公”——兼论成康时期周人对南土的经营[J].中国史研究,2017(1).
- [26]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7]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J].文物,1998(5).
- [28]蔡靖泉.庸人·庸国·庸史[J].江汉论坛,2010(10).
- [29]石泉.古郢、维、涑水及宜城、中庐、郢县故址新探——兼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郢都、汉宜城县[A].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 [30]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J].考古学报(第10册),1955.
- [31]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五)[J].考古学报,1956(3).
-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四卷)[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 [33]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J].文物,1976(2).
- [34]胡安莲.赖国地望与赖、厉关系论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二卷)[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 [36]宋衷.世本八种(秦嘉谟辑补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6(1).
-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五卷)[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 [39]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40]尹弘兵.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 [41]平顶山市文管会.河南平顶山市发现西周铜簋[J].考古,1981(4).
- [42]张肇武.河南平顶山市又出土一件邓公簋[J].考古与文物,1983(1).
- [43]张肇武.平顶山市出土周代青铜器[J].考古,1985(3).
- [44]国语·郑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三卷)[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 [46]王龙正.平顶山应国墓地九十五号墓年代、墓主及相关问题[J].华夏考古,1995(4).
- [47]陈昭容.从青铜器铭文看两周汉淮地区诸国婚姻关系[J].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五本第二分,2004.
- [48]徐少华.邓国铜器综考[J].考古,2013(5).
- [49]陈千万.湖北谷城发现的邓国铜器及相关问题[A].襄樊市考古队.襄樊考古文集(第一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 [5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谷城县博物馆.湖北谷城擂鼓台 M2 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22(3).
- [51]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M].北京:中华书局,1983.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

Investigation on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tatus of “Southern Soil” in Deng State in Zhou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aeology

Wang Xianfu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Wuhan 430077, Hubei)

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lands were enfeoffed to vassals as a barrier thus to protect the Zhou Dynasty. Several vassals, including the State of Deng, were successively sealed in the “Southern soil”. The Deng State began to be enfeoffed after King Wu destroyed the Shang Dynasty and was destroyed by the Chu State in 678 BC, 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300 years. Its political status wa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was relatively stable from the middle Western Zhou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late Western Zhou. From the back end of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the forefront of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lthough Deng State was somewhat weakened because of the threat of Chu State, its status was still relatively high.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ith the strong rise of the state of Chu to fight for hegemony in the north, the status of the Deng State declined rapidly and it finally perished to the State of Chu. Bronze wares with inscription still in existence and the unearthed, as well as the discovered archaeological relics of the Deng State, have witnessed the process of change.

Keywords: political status of Deng State; change; Southern Soil; Zhou Dynasty